

张西平:问学于中西之间

■苏悟森

2018年4月9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新书推介会,在北京意大利使馆如期举行。《丛刊》第一辑已于2014年问世,第二辑也将在近期出版。《丛刊》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这批珍贵文献的回归,是继敦煌文献、西夏文献回归后,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又一件大事。课题组负责人张西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域外汉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天南地北,碧海银波,往返于五洲之内,问学于中西之间。这部《丛刊》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汗水。

漂洋过海 文献回归

梵蒂冈图书馆以其丰富珍藏闻名于世,尤为难得的是,馆内藏有大批明清以来的中文图书,涵盖了宗教、科技、语言等多个领域,对研究中西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远在海外,中国学者对之了解尚少,更难以利用。

1998年7月,时任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张西平,受比利时南仁基金会之邀,赴鲁汶大学参加“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会后他遍访巴黎利氏学社、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档案馆,以及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1999年,他再次来到罗马,进行了三个月的访书活动,从此开启了他对欧洲藏明清文献长达数十年的追踪旅程。在这数十年当中,他曾多次到梵蒂冈图书馆查阅资料,几乎翻阅了馆内所有关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献,并做了足足20本读书笔记。

凭借研究传教士汉学的学术敏感,张西平意识到这批文献弥足珍贵。它们是来华传教士与明清文人在中国书写、木刻的善本古书,既包括传教士自己的作品,也包括中国教徒的原始文献。明清之际,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东亚,耶稣会入华。来华传教士“和儒易佛”,以刊书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这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和平对话的黄金时代,两大文明相遇而没有战争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为了传教事业,来华传教士积极学习汉语文化,编撰各种字典辞书;同时,他们也翻译和介绍欧洲的宗教、哲学与历史;此外,传教士还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明清之际传教士用中文写作的书籍,达1500—2000部,它们是“西学东渐”最基础的文献,对于明清历史、明清以来思想史、中国天主教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自晚清以来,因教案不断等各种原因,这批



张西平

文献在国内所留甚少。幸运的是,它们在梵蒂冈图书馆却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008年,迈入耳顺之年的张西平,回顾这数十年的寻书之旅,想到这批尚未回归的古籍文献,不禁感慨万千。也就在这一年,张西平与好友任大援教授,提出整理出版这批文献的构想。他们向清史编委会申请项目,为了立项顺利,由编译组于沛先生担任项目组长,当张西平拿着他那20本笔记来到清史编委会时,戴逸先生亲自拍板,于当年批准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项目。在多方支持下,经过五年的努力,项目组完成了复制工作,共复制回来30万页古籍。2014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丛刊》,共影印梵蒂冈图书馆藏天主教著作170部,分为44册;第二辑西方科技与星图舆图类,将于年底出版;其余汉外词典、稿本抄本等部分,也将在近年陆续问世。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项目,此次合作成为中梵文化外交的典范。

六年国图 学术转型

张西平整理出版这批文献的远见,与他当初在国图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正是在国图期间,他开启了从西方哲学到海外汉学的学术转型。

作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张西平在大别山下度过了他的知青岁月。在山区冬夜的煤油灯下,他培养起良好的读书习惯。32岁时,他从总后部队院校考入解放军政治学院,成为一名哲学教员。接着,他又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系,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当时,他

的研究方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毕业论文选的是卢卡奇。他翻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及后来在三联“哈佛燕京丛书”中出版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完成于这一时期。

然而,在张西平40岁之际,他在精神与学术上陷入困顿,工作也一时未有着落。经哲学所的老师 and 师友,如叶秀山、王树人、姜国柱等先生的介绍与推荐,时任国图馆长的任继愈先生,接纳了他。于是他调入国图工作,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张西平希望从西方哲学研究转向中国哲学研究,于是就向任先生请教。经过两三个月的慎重思考,任先生对他说,你可以做来华传教士与明清之际思想变迁关系的研究。任先生的话,仿佛拨云见日,让处于思想迷茫期的张西平,看到一条崭新的学术之路。沿着这个方向,张西平转入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

与此同时,一些学术先贤吸引了他的目光。方豪先生主编的《上智译馆馆刊》,成为他每日必读之书;陈垣先生曾说过的,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像《开元释教录》那样,做一个基督教总目;我们应该像《宋高僧传》那样,为每个来华传教士立个传”,这成为他的奋斗目标。六年国图时光,提供给张西平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在国图,他一本本寻找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和汉学书籍;在善本部,他见到了利玛窦地图残卷、《北堂书目》摇篮本以及尚未编入《北堂》的传教士手稿;在港台室,他读到了《天学初函》和《天主教东传文献》一批珍贵文献。在参考部办公室里,他多次听王丽娜老师讲《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王丽娜编辑国图汉学书目的理想,在很

长时间里也成为张西平的梦想。

随着研究的展开,张西平发现传教士不仅有中文著作,还有大量外文著作,他们不仅促进了“西学东渐”,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为了研究传教士外文文献,张西平先后学习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就在这个时候,任先生提出,希望编辑一本反映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杂志《国际汉学》。此时,张西平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在他的德语老师,汉学家弥雅礼先生的资助下,《国际汉学》第一期于199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杂志成为张西平后来展开学术研究的阵地。

1994—1996年,张西平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做了近两年访问学者。《华裔学志》是欧洲两大汉学杂志之一,当年在北京创刊时的主编是陈垣先生,研究所主要从事传教士汉学研究。当年老辅仁大学许多珍贵的图书版本,有不少就藏在这里。访学期间,每天踏着林间落叶,听着修道院的晚钟,烟敛云收,覃思多暇,张西平想清楚了什么是汉学,也明白了任先生指给他的两条路——传教士文献与国际汉学,原来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国后,转型中的国图,已经无法实现张西平的学术梦想。经文学所王筱云介绍,张西平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启航。

耕耘北外 汉学新篇

1996年,时任北外中文系主任的程裕祯,在拿波里教对外汉语时,了解到欧洲悠久的汉学传统。回国后,他希望成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招揽懂汉学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西平转入北外工作。

当时的研究中心是个“三无”研究所,无编制,无费用,无办公地点。每天上完课后,在一个不过五平方米的过道房间里,张西平与二三好友,编辑任先生嘱托的《国际汉学》杂志。1998年,在杭州“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上,北外校长陈乃芳得知研究所实情,会后决定每年给一万元活动费用,于是研究所有了固定经费。

在程裕祯的鼓励下,张西平开始关注明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史。1999年和2001年,他分别获得国际汉办项目“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和“西方人汉语学习专题研究”,从此开创出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这个新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对外汉语学科提供了学科史的支撑,还促进了中国近代语言学的研究。2004年,张西平创办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推动全国乃至世界该领域学者的共同耕耘,如今,这一领域已经红红火火地发展了起来。

在他的带领下,北外的海外汉学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一方面他组织团队,翻译出版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原典性著作,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等。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发展阶段的论断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他先后出版的《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欧洲早期汉学史》等著作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2005年,郝平校长的到来,对张西平和他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产生了重要影响。郝校长是学历史出身,曾经留学美国,对美国汉学十分熟悉,因此他完全理解海外研究中心的学术价值,并拨专款支持中心的发展。在北外65周年校庆上,郝校长正式提出“北外新使命——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口号,并将汉学中心的工作,从学术研究层面,提高到学校发展战略层面。2008年汉学中心正式从中文学院独立出来,成为学校的独立研究所,北外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在郝平校长的支持下,张西平于2007年申请到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20世纪中国古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他撰写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梳理了16—18世纪中国典籍在欧洲的传播情况,并从历史和文化比较的角度,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2010年,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委托,他领衔“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的建设。2012年,北外牵头,与其他著名大学共同成立了“中国文化

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他担任国际儒联副会长,致力于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平等对话。北外这所因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而著名的大学,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文化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张西平的带领下,如今的汉学中心,不仅是北外科研的中坚力量,也是全国海外汉学研究的领军机构。2014年,北外汉学中心与法兰西学院,在巴黎共同举办了“雷慕沙的继承者:法国汉学200周年纪念”研讨会,是见北外汉学中心在国内的学术影响。此外,任继愈先生生前委托他担任主编的《国际汉学》历经19年努力,在北外彭龙校长的亲自关怀下,于2014年获批成为正式刊物,并在2017年正式成为C刊。一份纯粹的民间学术辑刊,完成了他的华丽转身,如今成为国内唯一一份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学术刊物。期间张西平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如今,已逾古稀的张西平,依然笔耕不辍,思考诸多前沿问题,学术写作与出版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今明两年,大象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他主编的19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丛书;由他主编的《西方汉学书系》中两部重要的名著——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柏应理主编的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多年翻译也即将出版;《梵蒂冈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出版计划在稳步推进,最终将会达到150卷左右。而具有开拓创新的西方学历史文献《罗马史文丛》《白晋文集》《雷慕沙文集》的文献整理与翻译的出版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北外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郝校长正式提出“北外新使命——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口号,并将汉学中心的工作,从学术研究层面,提高到学校发展战略层面。2008年汉学中心正式从中文学院独立出来,成为学校的独立研究所,北外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交错的文化,互动的东西方”,是近期张西平一篇论文的题目,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学术追求。在世界中思考中国,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重新评价中国文化价值,在中西文化互动中重新理解西方,重新书写世界史,走出百年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他的学术追求。学问问西东,学问需要长期的积累,学界需要一批像张西平这样为整个中国学术的重建而埋头苦干、勇于开拓的人。40年青灯黄卷的学术历程,让张西平对自己有了明确定位。他说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不是去追求个人的功名,而是在中西学术之间,架起桥梁,搬砖添瓦,打牢基础、做足准备,为下一代学术的起飞做一颗铺路石。

陈独秀戏曲观的转变

■郭丰涛

作为清末民初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先驱,陈独秀在政治、文化、文学各个领域皆有独创性的论著,而且影响深远。1905年,陈独秀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第2卷第2期上发表《论戏曲》一文,虽然不是他诸多社会与文化批评著作中特别重要的文章,但在二十世纪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该文从戏曲的社会功能、戏园的社会价值、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三个方面对戏曲这一本土的大众艺术予以重新定位。陈独秀认为“戏曲,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戏曲用以教人,戏园自然成了学堂,戏曲艺人便是教师。

中国戏曲自诞生以来,以歌舞演绎、塑造着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及伦理道德取向,虽在社会与文化整合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天生所带的浓厚民间性、世俗性,教之诗文,戏曲一直被视作玩娱之物,正统文人不屑为之,长期以来被摒弃于文坛边缘。至于戏曲艺人,世人莫不以“无用待之”,毫无社会地位。徐幕云《中国戏剧史》自序“每视戏剧为娱乐品,故国人恒目优伶为卑贱者流,而以习梨园行者为可耻之事;纵有文人学

士欲治剧史,终恐被人讥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遂均望望然去之,不肯贸然问津。”

因此,陈独秀持此等戏曲观念,可谓见识卓越!事实上,陈独秀对于戏曲的重视,早在其1904年主持《安徽俗话报》时即已显露。从第3期起,该报专门开辟“戏曲”这一栏目,使这一方面的内容成了俗话报文学作品中的重点。总共只出了22期的俗话报,光戏曲剧本创作就刊登过6篇。《论戏曲》一文原本最早就是以白话刊于俗话报第11期。

然而待到1918年,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对戏曲的态度大转。在其主编的杂志《新青年》上,专门刊出了两个文学专号,旨在讨论戏剧问题,分别是1918年6月、10月的“易卜生号”和“戏剧改良号”。以专文展开讨论的是陈独秀的北大同仁胡适、傅斯年等,在诸位眼里,传统戏曲从内容到形式已变得陈腐不堪,绝非内容的更新就可以完成自救。对旧戏毫无留恋的弃否后,他们希望全部接受西洋戏剧(话剧)来建设中国新戏剧。同时,他们还特意邀请拥护旧剧的北大学生张厚载参加辩论,这就是日后著名的五四新旧戏剧论争。

陈独秀虽未发表专文,但在给张厚载有关戏曲评论的回复中表达了如下见解:“剧之为物,所以重于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乎?”至于“打脸”、“打靶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若谓其打有定法,脸有脸谱,而重视之邪?则作八股文之路闻生等。写馆阁字之黄白元等,又何尝无细密之定法,“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然其果有文学上美术之价值乎?”陈独秀以反面的语气实际否决了中国戏曲在文学、美术、科学上的价值,甚至进一步批判中国戏曲的某些表演“程式”“隐喻着中国人低劣的品性”。

仅仅十三年,陈独秀对待戏曲的态度,前后反差不可谓不大。究其原因有二:一、文化规范不同;二、注重戏剧工具化职能。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知识分子纷纷开始“别求新声”,传统中国开启了现代化之改革成为社会改良者的共识,然其最初的思想路向乃在坚守自己文化本位基础上的适度调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有一律被视作被等同落后、腐朽,而以

欧美为代表的文明制度则被视作现代。但是,甲午海战的大败,宣告了单纯从物质层面变革中国的“洋务运动”破产。社会改良者意识到致中国屈辱的症源乃哺育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母体文化,对之批判的同时,冀以引入促使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各启蒙理念,塑造“新民”,完成本民族的现代转化。由于戏曲声色兼具的形象表演容易动人感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而且相对于“创学校、编小说、开报馆”,戏曲的普及面广,“对于戏曲的器重而倡导戏曲改良已成为晚清民初社会改良者的共识。但是,等到1918年,时代语境发生转变。此时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胡适等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为中国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规范。原本尚存自信的传统文化一

律被视作被等同落后、腐朽,而以欧美为代表的文明制度则被视作现代。但是,甲午海战的大败,宣告了单纯从物质层面变革中国的“洋务运动”破产。社会改良者意识到致中国屈辱的症源乃哺育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母体文化,对之批判的同时,冀以引入促使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各启蒙理念,塑造“新民”,完成本民族的现代转化。由于戏曲声色兼具的形象表演容易动人感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而且相对于“创学校、编小说、开报馆”,戏曲的普及面广,“对于戏曲的器重而倡导戏曲改良已成为晚清民初社会改良者的共识。但是,等到1918年,时代语境发生转变。此时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胡适等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为中国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规范。原本尚存自信的传统文化一

律被视作被等同落后、腐朽,而以欧美为代表的文明制度则被视作现代。但是,甲午海战的大败,宣告了单纯从物质层面变革中国的“洋务运动”破产。社会改良者意识到致中国屈辱的症源乃哺育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母体文化,对之批判的同时,冀以引入促使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各启蒙理念,塑造“新民”,完成本民族的现代转化。由于戏曲声色兼具的形象表演容易动人感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而且相对于“创学校、编小说、开报馆”,戏曲的普及面广,“对于戏曲的器重而倡导戏曲改良已成为晚清民初社会改良者的共识。但是,等到1918年,时代语境发生转变。此时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胡适等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为中国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规范。原本尚存自信的传统文化一

律被视作被等同落后、腐朽,而以欧美为代表的文明制度则被视作现代。但是,甲午海战的大败,宣告了单纯从物质层面变革中国的“洋务运动”破产。社会改良者意识到致中国屈辱的症源乃哺育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母体文化,对之批判的同时,冀以引入促使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各启蒙理念,塑造“新民”,完成本民族的现代转化。由于戏曲声色兼具的形象表演容易动人感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而且相对于“创学校、编小说、开报馆”,戏曲的普及面广,“对于戏曲的器重而倡导戏曲改良已成为晚清民初社会改良者的共识。但是,等到1918年,时代语境发生转变。此时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胡适等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为中国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规范。原本尚存自信的传统文化一